

19 世纪以来印度帕西人的社会融入与生存挑战^{*}

谢志斌

内容提要 19 世纪,印度帕西人在法国、英国、葡萄牙、荷兰等欧洲国家进入印度时,凭借自身的精湛技艺、经商天赋和优良品格,迎接挑战,抓住机遇,通过造船业、纺织业、经理行等途径,实现了经济上的崛起,成为印度的精英阶层,对印度乃至整个南亚地区的经济和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帕西人积极引进西方教育,并进行了内部管理机构和宗教传统的现代化改革。然而,20 世纪以来,帕西人面临着商业萎缩和多种内外冲突的挑战,尤其正遭受着人口锐减的严重威胁。

关键词 帕西人 印度 族群 琐罗亚斯德教

公元 8 世纪至 10 世纪,古代伊朗地区的一部分琐罗亚斯德教徒因不愿改宗伊斯兰教而背井离乡,迁往印度西海岸。他们保持着古老的宗教信仰,在新的土地上经过长期调适,最终成功融入新环境,成为印度非常重要的少数族裔,并以“波斯”谐音被称为“帕西人(Parsis)”^①。帕西族群虽人口数量少(其人口总数约为印度总人口的 0.007%),但他们在 19 世纪实现经济崛起,成为印度的精英阶层,在印度西部成为一个经济发达和受人尊敬的商人族群^②,对印度的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20 世纪中叶以来,帕西人的影响力逐渐下降,人口锐减,部分成员分散海外,甚至不少人担忧这个族群会在未来消亡,并认为这个民族宗教团体的灭绝也将导致琐罗亚斯德教宗教传统的丧失。^③

国外对帕西人的研究起步较早且成果丰富,但国内的相关研究较为罕见。^④本文拟就近现代印

^{*} 本文是 2021 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项目编号:2021C002)和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1J127)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审稿专家和《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提出的修改建议,作者文责自负。

^① Parsi、Parsis 或 Parsee 中文一般译作帕斯人、巴斯人或帕西人,历史文献中中国人称其为“叭史”(参见谢清高述、杨炳南记,冯承钧译:《海录注》,商务印书馆,1938 年,第 58 页、“港脚人”(参见(美)亨特著,朴树惠译《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7 页、“港脚白头子”(参见黄楸材《印度割记》,载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三册十一帙,第 449 页、“白头人”(参见《每月统纪传》,载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二帙,《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二十册,杭州古籍书店,1985 年)等。

^② J.Palsetia, *The Parsis of India: Preservation of Identity in Bombay City*, Leiden: Brill, 2001, p.11.

^③ M.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1979, p.289.

^④ 国外主要成果有: Dosabhoi Framjee, *The Parsees: Their History, Manner, Customs and Religion*,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58; Dadabhai Naoroji,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Parsees*, Whitefish: Kessinger Legacy Reprints, 1864; Jivanji J.Modi, *The Religious System of the Parsees*, Bombay, 1885; Jivanji J.Modi, *A Few Events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Parsis and their Dates*, Bombay, 1905; Hodivala Shapurji Kavasji, *Parsis of Ancient India*, Bombay, 1920; Hodivala Shapurji Kavasji, *Studies in Parsi History*, Bombay, 1920; Jivanji J.Modi, *Religious Ceremonies and Customs of the Parsis*, Bombay, 1922; Eckehard Kulke, *The Parsees in India: A Minority as Agent of Social Change*, Munich: Weltforum Verlag, 1974; P.Nanavutty, *The Parsis*, New Delhi: National Book Trust, 1977; M.M.Murzbani, *The Parsis in India*, 2vols, Bombay, 1977; Dosabhai Framji Karaka, *History of the Parsis: Including Their Manners, Customs, Religion, and Present Position*,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86; Dastur Dr.Hormazdyar Kayoji Mirza, “Outlines of Parsi History”, *Zoroastrian Religion & Ancient Iranian Art*, 1999 等。国内相关成果有:龚方震、晏可佳《袄教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年;郭德焱《清代广州的巴斯商人》,中华书局,2005 年;赵瑛《印度帕西人的由来、发展及其面临的问题》,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年;曾超颖《帕西人的迁徙、经济崛起与慈善事业述论》,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年。

度帕西族群的发展与现状进行研究,梳理 19 世纪帕西人经济崛起的过程与原因,并对 20 世纪出现的商业挑战、内外冲突、人口锐减等问题进行解析。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国内学术界对帕西族群的研究,对琐罗亚斯德教的现当代发展史研究有所补充,对思考微小族群在当今世界的生存现状和发展趋势提供参考。

一、印度帕西人的经济崛起

从帕西人的发展史来看,他们似乎拥有一种特殊的经商天赋。这种天赋既来源于波斯故土的文化滋养,也“仰仗”于长期的颠沛流离。也正是这种经商天赋,使他们在时代巨变的浪潮中崭露头角,为其在印度的生活处境带来巨大变化。

1. 经济崛起的过程和表现

早期生活在印度西海岸的帕西人以农耕、畜牧为生,同时他们继承并发扬了波斯祖先留下来的纺织工艺,以丝织品的精丽著称于印度。他们织出的丝织品“苏提盖特(surti ghat)、盖罗(garo)和昙绸衣(tanchoi),皆为萨珊王朝时期波斯手工业的精品”^①。精美的丝织品引来不少贵族和富豪购买,这为定居印度的部分帕西人积累了一笔财富。凭借早期资本积累和经营能力,部分帕西人在坎巴特、巴鲁奇和后来的苏拉特等著名港口成为商人和商业代理人。^②

15—17 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是近代殖民史的开端,法国、英国、葡萄牙、荷兰等国相继进入印度,这既改变了整个印度社会,也给帕西人带来了挑战和机遇。15 世纪以来,很多帕西人选择在苏拉特和纳夫萨里定居,其中一些人成为土地承包商,通过收取税费获得资金积累,另一些人则投身于航海、造船和贸易行业。尤其 17 世纪,欧洲贸易公司的出现极大地增加了帕西人的财富。^③

帕西人的经济崛起伴随着几大贸易中心的先后兴替。起初,苏拉特凭借特殊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贸易中心,吸引了印度各族商人聚集此地,其中也包括帕西人。但随着孟买被葡萄牙人转交给英国人,该地逐渐取代了苏拉特的往日繁华,成为新的贸易中心,也成为后来帕西人最重要的聚集地。最初定居孟买的少量帕西人,主要是苏拉特派驻此地的商行经理人。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迁入,大批帕西人移居至此。与此同时,孟买政府也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两项举措:第一,凡是移民到孟买的人都将平等对待,受到法律保护;第二,商人从事贸易,可以获得东印度公司贷款、外贸权和 5 年的债务豁免。^④至 17 世纪末,随着瓦底亚家族等帕西大家族定居孟买,孟买帕西族群的人数和影响力逐渐上升,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 18 世纪。据英国海军上尉穆尔(Moore) 1794 年的记载,“帕西人是孟买岛上的主要土著居民,他们不仅占有最多的私有财产,而且拥有大量的港口泊位。”^⑤1840 年之前,孟买地区的私人贸易几乎都在帕西人的掌控之下。以至于 1836 年正式成立孟买商会之际,当时印度成员共 10 名,而他们全是帕西人。^⑥

到了 19 世纪中叶,帕西人已经成为孟买的精英阶层,受到英国人的青睐,尽管他们人数很少(1864 年占孟买人口的 6.04%),但他们主宰了城市的经济、知识和政治生活。^⑦到 20 世纪 70 年代,

① 曾超颖《帕西人的迁徙、经济崛起与慈善事业述论》,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年。

② J.Palsetia, *The Parsis of India: Preservation of Identity in Bombay City*, Leiden: Brill, 2001, p.23.

③ J.Hinnells, *Zoroastrianism and the Parsis*, Bombay: K.R.Cama Oriental Institute, 1981, p.251.

④ M.D.David, *History of Bombay 1661-1708*, Bombay: University of Bombay, 1973, p.444.

⑤ John R.Hinnells, “Zoroastrian and Parsi Studies”, *Selected Works of John R.Hinnells*, Aldershot,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08.

⑥ Raymond J.F. Sullivan, *One Hundred Years of Bombay: History of the Bombay Chamber of Commerce, 1836-1936*, Bombay: University of Bombay, 1937, p.10.

⑦ J.Palsetia, *The Parsis of India: Preservation of Identity in Bombay City*, Leiden: Brill, 2001, p.21.

孟买作为全印度帕西人最集中的地方,拥有70000帕西人,几乎占帕西人总人口的70%。^①

2. 经济崛起的主要途径

帕西人在印度定居后逐渐融入印度社会并获得认可和尊重。19世纪早期,帕西人又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开发国际市场而获得巨大利润。帕西人经济崛起的主要途径有以下几种:

第一,通过土地积累财富。尽管18世纪时,因为高度的城市化,只有少数帕西人仍从事农业生产,但其中有一些人因为曾被莫卧儿帝国的国王册封为扎吉尔^②,所以有权用自己的土地来收取税费。^③于是,一批人得以通过土地积累财富。如帕西祭司麦盒吉·热娜(Meheji Rana)曾经为阿克巴国王讲解琐罗亚斯德教教义,被封为享有80亩土地的扎吉尔,其子也获封40亩。^④一直到19世纪早期,帕西人的资产几乎主导了孟买经济,正是因为他们为孟买最主要的地产拥有者。

第二,造船业是帕西人早期发展的重要行业。帕西人最早是以建筑和船只建造为欧洲人所知,所以当英国东印度公司计划在印度开设造船厂时,首先便考虑到与帕西人合作。早在1700年,帕西人就应东印度公司之邀在塔普提河(Tapti)上建造了苏特拉船厂,后来该厂的管理权也移交给了帕西人。苏拉特地区在17、18世纪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帕西造船商。如瓦迪亚家族创始人劳治·那沙湾治·瓦迪亚(Lavji Nusserwanjee Wadia)为东印度公司工作了35年。瓦迪亚家族更是在将近一个半世纪里,共建造了335艘战舰和护卫舰,修复船只无数。英国人进驻孟买并展开大量建设工程,为帕西人的发展再次带来了良机。孟买的第一家造船厂是麻扎干(Mazagaon)船厂,自成立后百余年间该船厂为英国东印度公司造船达360艘。该厂的组织、建设工作正是由帕西人楼吉·努色万机(Lowjee Nusserwanji)承担的。^⑤据统计,仅1795年至1796年,停靠在孟买港口的船只中,帕西人所控制的船只总吨位几乎是欧洲所控制船只的两倍。^⑥在这样的形势下,一大批帕西人投入造船业并获得财富。

第三,帕西人的经济崛起离不开纺织业。19世纪,英国因长期征战极大地增加了对棉纺织品的需求,因而间接促进了帕西人在纺织行业的发展。在印度国内,从19世纪中期开始,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开始出现。“1854年,帕西商人在孟买创办的第一家棉纺织工厂正式投产,开启了印度民族资本家创办民族工业的大门。”^⑦19世纪60—90年代,印度民族工业大力发展棉纺织业,并且主要集中在孟买。至1895年,孟买的棉纺织厂共计72家,其中58家印资纺织厂中帕西人所占超过一半。此外,帕西人还在英国的支持下展开了以棉花为主的对外贸易,交易地区一直扩展到缅甸、东非、波斯湾地区,乃至中国。

第四,担任西方人的代理人或经纪人是帕西人最获利的行业。当欧洲列强入侵印度时,帕西人因其“客籍”身份以及不同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相对于其他印度民族来说更易于合作。对于西方人带来的新事物,帕西人也更容易接受,并较快地捕捉到了其中的商机。从1661年到1840年,帕西人几乎垄断了欧洲与孟买之间的贸易往来,各种大规模的交易和商务船只都掌控在帕西人手中。

① 龚方震、晏可佳《袄教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306页。

② “扎吉尔”的意思是奖励获得的土地。封地人即扎吉尔,有权终身征收封地地税,但不能世袭,没有封地的所有权。此外,他们必须为皇帝提供军事服务。扎吉尔可以把土地再次分封给低于其地位的人。参阅D.L.White, “T'arsis in the Commercial World of Western India, 1700-1750”, *Indian Economic & Social History Review*, vol.183, no.24, 1987.

③ V.A.Desai, “The Origins of Parsi Enterprise”, *Indian Economic & Social History Review*, vol.307, no.5, 1948.

④ Dosabhoj Fratinjee, *The Parsees: Their History, Manner, Customs and Religion*,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58, p.200.

⑤ V.A.Desai, “The Origins of Parsi Enterprise”, *Indian Economic & Social History Review*, 1948, vol.307, no.5, 1948.

⑥ A.Guha, “Parsi Seths as Entrepreneurs, 1750-1850”,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35, no.29, 1970.

⑦ 王方勤《印度民族工业的发展研究(19世纪中叶——战前)》,贵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页。

随后,鉴于帕西人精于商业且与欧洲人往来时灵活自如^①,葡萄牙、法国、荷兰的工厂也都大多雇佣帕西人为经纪人。经理行不仅具有接受建厂委托、提供设备资金、承销产品、办理存款等广泛职能,而且在企业成立后,还往往持有部分股份,甚至掌握企业的实际控制权。随着资本产出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工厂由经理行控制。经理行还可以利用资金建立自己的企业。

此外,帕西人的经营范围还涉及其他很多行业,如钢铁、造纸、蒸汽航运、煤炭船运、铁路、金融等。从 18—19 世纪,相较于印度其他民族和欧洲人,帕西人在孟买拥有的企业数量是最多的。

3. 经济崛起的主要原因

从 19 世纪开始,帕西人便在印度的经济发展中脱颖而出。他们不仅开创了印度的棉纺织工业,而且在造船业、制造业等工业领域和贸易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帕西人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释。

第一,帕西人自身勤劳诚朴,善于交际。多种文献证明,帕西人普遍拥有较为优良的自身品格,颇受赞誉。部分欧洲人早期游历印度时,帕西人就让他们印象深刻。1638 年,葡萄牙旅行家曼德索(Mandelslo)在游记中对帕西妇女描述道“她们是印度人中最美丽动人的。”^②1804 年,欧洲旅行家乔治(George Viscount Valencia)在游记中赞扬帕西人的慈善、智慧和流利的英语,称其为“慷慨的族群”^③。欣内尔斯称赞其“富有、活跃而真诚。”^④中国也有人赞许他们“俭约勤作”^⑤。帕西人凭借着自身的较高素质,先声夺人,占得先机。

第二,帕西人技艺精良。出众的能力也是帕西人获得欧洲人的青睐和信任的重要因素。1716 年,英国船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报告中说“帕西人吃苦耐劳,非常擅于经商和从事农业生产。他们也是很出色的木工和造船工匠,而且在手工艺品、丝织品、刺绣等方面也非常精通。”^⑥他们的精湛技艺也曾得到清人的青睐,文载“其白头人手艺甚妙,建船固美焉。”^⑦此类记述颇多,帕西人的高超技艺可见一斑。

第三,帕西人不受印度传统的束缚。印度的种姓制度、宗教禁忌等传统根深蒂固,而且与社会结构紧紧捆绑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族发展的阻碍。但帕西人作为“客籍人”,不必拘泥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传统,既可以与欧洲人一样自由地享用猪肉、牛肉,又可以无拘无束地畅饮马德拉酒(Maderia)^⑧,在生活习俗方面表现出相当的亲和力,而且“与印度其他族群相比,他们深谙处世之道,方法灵活,无往不利”^⑨。所以,在印度其他族群仍受缚于传统的制约而与欧洲人扞格难通时,帕西人却左右逢源。

第四,帕西人较早地与西方人建立关系并全方位西化。在印度近代经济发展史上,帕西人与英国人是一种相互依靠的关系。在诸多来印的欧洲人中,帕西人选择成为“英王陛下的臣民”^⑩,并极力迎合。同时,英国政府与葡萄牙相比更加看重稳定和长远发展,试图建立正常的商业秩序,因此

① 龚方震、晏可佳《袄教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年,第 304 页。

② Piloo Nanavutty, *The Parsis*, New Delhi: National Book Trust, 1977, p.47.

③ John R.Hinnells, “Zoroastrian and Parsi Studies”, *Selected Works of John R.Hinnells*, Aldershot: Ashgate, 2000, pp.109–110.

④ John R.Hinnells, “Zoroastrian and Parsi Studies”, *Selected Works of John R.Hinnells*, Aldershot: Ashgate, 2000, p.164.

⑤ 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 年,第 233 页。

⑥ Alexander Hamilton, *A New Account of the East Indie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727, p.161.

⑦ 《每月统记传》,载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二帙,《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二十册,杭州古籍书店,1985 年;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 年,第 233 页。

⑧ S.A.A.Rizvi, *Landmarks of South Asian Civilizations, from Prehistory to the Independence of Subcontinent*, New Delhi: National Book Trust, 1983, p.278.

⑨ John R.Hinnells, “Zoroastrian and Parsi Studies”, *Selected Works of John R.Hinnell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13.

⑩ 郭德焱《清代广州的巴斯商人》,中华书局 2005 年,第 29 页。

非常重视与帕西人保持良好而持久的关系。如1792年2月29日,因一名孟买的英国人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贸然闯进帕西人的太平间而给当地帕西人带来麻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执行主席严厉惩处,并发布指令:“如果有雇员、商人或受雇的军官和士兵擅自闯入帕西人的墓地、庙宇或工作场所,此人将不再受雇于东印度公司,他们将被吊销执照或开除军籍,并被遣送回英国。”^①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政治、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帕西人得到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也日渐丰厚,推动了帕西族群的快速发展。^②在此过程中,帕西人也很快适应了西方的方式。^③他们开始学习英语和欧洲礼仪,成为整个印度最早在生活模式上走向近代化的民族。^④渐渐地,帕西人的生活习惯和服装发生改变,商人们通过模仿英国服装来丰富生活。^⑤“欧化”后的帕西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现代欧洲的商业精神。^⑥全方位西化,使他们既精于商业,又在与欧人往来时灵活自如^⑦,为帕西族群的崛起助益良多。当然,全方位西化也为他们日后的人口危机等问题埋下了隐患。

二、印度帕西人的现代化改革与社会贡献

帕西人的现代化与经济崛起是互相促进的。伴随着经济崛起,帕西族群的现代化改革也随之展开,主要表现在管理机构和宗教方面的改革。而他们经济崛起和现代化改革的成就又进一步体现为乐于捐助公益的社会贡献。

1. 管理机构的改革

帕西人定居印度之初,宗教祭司充当着族群领袖的角色,对内进行生活和宗教的裁决,对外进行外交,逐渐形成了由“长者”(akabir)主导的“长老会”组织。但从17世纪开始,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普通信徒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影响力不断增强,甚至超过了祭司阶层。同时,长老会在处理日益复杂的社会和宗教事务时常常力不从心。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之前的长者和新兴的有影响力的普通信徒共同组成的“大公会”便应运而生。

1642年,第一个帕西人的大公会在当时最繁华的帕西人聚集地纳夫萨里成立。大公会有权裁决争议、宣布处罚。1728年(一说1673年),影响力更大的孟买大公会成立,5个成员都是出自大富家族的普通信徒。同年,在“欧洲三人委员会”的建议下,孟买当局承认了大公会的合法性,进一步巩固了大公会在帕西族群中的权威性。后来,孟买总督参事会责成大公会进行改革。于是帕西祭司和普通信徒各选出12人,再由孟买当局从中任命6名祭司和6名平信徒,组成了新的大公会。这样的改革,一方面有利于平衡祭司和普通信徒的力量,另一方面有益于大公会获得帕西族群的普遍认同。1787年1月1日,经过改革的帕西大公会正式成立,有权裁定与帕西人相关的一切社会和宗教事务,并特别强调“对于任何派系,严守公平;对任何人绝不畏惧、绝不偏爱、绝不感情用事”^⑧。新成立的帕西大公会在一定程度上担当了调停内部纷争,维系族群安定和谐,从而实现自我管理的职能。1818年,孟

① James Douglas, *Bombay and Western India*, Whitefish: Kessinger Legacy Reprints, 1893, p.147.

② 赵瑛《印度帕西人的由来、发展及其面临的问题》,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15—18页。

③ E.Kulke, *The Parsees in India: A Minority as Agent of Social Change*, Munich: Weltforum Verlag, 1974, p.71.

④ K.N.Vaid, *The Overseas Indian Communit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2, p.50.

⑤ Dosabhai Framji Karaka, *History of the Parsis: Including Their Manners, Customs, Religion, and Present Position*,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86, p.244.

⑥ Dosabhai Framji Karaka, *History of the Parsis: Including Their Manners, Customs, Religion, and Present Position*,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86, p.261.

⑦ 黄桦材《印度割记》,载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三册十一帙,第443页。

⑧ Dosabhai Framji Karaka, *History of the Parsis: Including Their Manners, Customs, Religion, and Present Position*,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86, p.233.

买帕西人在达迪赛特(Dadseth) 的火庙选出由 18 人组成第二届大公会, 其中普通信徒的数量增加到 12 人, 祭司仍保持 6 人, 并明确大公会从祭司负责改为成员共同决断, 又制定了一夫一妻制等一系列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的新规范。然而, 30 年代后, 大公会成员多由富族子弟接替父辈职位, 该组织也出现严重的腐败和涣散问题, 最终在 1836 年宣告解散。19 世纪下半叶起, 大公会逐渐演变成为一个从事慈善事业的民间公益组织。^①

2. 宗教的现代化改革

1820 年以来, 印度向英国的教育模式学习。早期来印的欧洲人在印度修建的学校, 其就读者多为帕西人。“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殖民时期, 引入西式教育并融入西方人群, 无疑是最快崛起的有效捷径。”^②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 帕西人开始致力于引进西方教育, 建立基础教育机构, 培养新型人才。可以说, 帕西人从这些新式教育中获得的益处远多于其邻人。^③教育的现代化和社会的变革给帕西族群的祭司阶层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一方面, 随着普通信徒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祭司阶层的地位和权威性受到怀疑并被一再限制, 他们在世俗生活方面的发言权几乎完全丧失; 另一方面, 有些祭司的文化水平低下, 思想固化保守, 没有办法继续为文化水平日益增强的帕西人答疑解惑。于是, 一些专门培养祭司子弟的神学院相继成立, 但是总体上未能拯救祭司阶层不可挽回的颓势, 反而受到帕西族群内部的批判和嘲讽。此外, 基督教的传播对帕西祭司也造成一定冲击, 比如基督教为了争取信徒, 常常会批判琐罗亚斯德教的落后性, 并指责祭司的宗教素质和文化水平。

与祭司阶层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化造就了一批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先进理念的年轻知识分子, 这些普通信徒开始以西方比较宗教和语言学方法研究琐罗亚斯德教。如 K.R. 卡玛(Kursteji Rustomji Cama) 于 1858—1860 年在巴黎和埃尔兰根(Erlangen) 的著名伊朗学专家莫尔(Moh) 和斯皮格尔(Spiegel) 的指导下研究琐罗亚斯德教, 以帕西人的伊朗学奠基人之誉名噪一时, 在西方学术界也享有盛名, 被詹姆斯·达姆斯特德(James Darmesteter) 称为“在俗祭司”。卡玛回到孟买后, 于 1864 年成立“琐罗亚斯德教研究促进会”(Zarthoshto din-ni Khol Karnari), 一些祭司子弟也投于门下, 有的成为日后帕西伊朗学研究的佼佼者。这些祭司子弟学成之后虽有祭司的称号, 但大多在神学院任教, 或游学西方, 或以著述为业, 而不愿担任专职祭司。

在这样的形势下, 宗教改革思潮在一批接受过新思想的帕西年轻知识分子中间不断酝酿发酵, 终于在 19 世纪中叶爆发, 掀起了一场振兴琐罗亚斯德教的改革运动。相对于主张保留琐罗亚斯德教传统的“正统宗教协会”(Rahe Rastnumae Zarathustrian Sabha), 主张改革的势力成为主流, 主要有改革派、神智学派和神秘主义三种派别。改革派主张剔除琐罗亚斯德教中那些本不属于该教的因素, 还要剔除那些与现代社会不协调的落后因素; 神智学派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改良派, 希望保留琐罗亚斯德教的传统, 调和其与科学、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 神秘主义派强调严格奉守仪式, 具有强烈的苏非神秘主义色彩。^④

3. 乐于捐助公益

帕西人的经济崛起极大改善了他们在印度的生活处境和社会地位, 同时, 对于印度社会来说, “由于帕西人的迁入, 极大地促进了这片居住地的繁荣”^⑤。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孟买帕西人在社会和经济上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时期, 他们在最高收入群体中的占比极高。帕西人凭借着雄厚的经

① 参见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

② John R.Hinnells, “Zoroastrian and Parsi Studies”, *Selected Works of John R.Hinnell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13.

③ Eckehard Kulke, *The Parsees in India: A Minority as Agent of Social Change*, Munich: Weltforum Verlag, 1974, p.71.

④ 详见韩志斌、谢志斌《伊朗琐罗亚斯德教的流变轨迹》, 载《世界宗教文化》2019 年第 6 期。

⑤ John R.Hinnells, “Zoroastrian and Parsi Studies”, *Selected Works of John R.Hinnell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64.

济实力,对印度社会尤其孟买的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都做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尤其在公益慈善方面的投入和成就相当突出。他们的公益捐助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领域。

第一,帕西人最热衷的公益事业往往是围绕宗教展开的。建造火庙、“寂静之塔”等与琐罗亚斯德教相关的建筑是帕西人最重要的慈善事业。^①作为帕西人墓地的“安息塔”(daxmas)本来由集体集资修建,但自18世纪后期以来,大部分的安息塔都由慈善基金会捐建。^②

第二,帕西人最重视的公益事业是资助教育。“孟买本土教育协会”(Bombay Native Education Society)在1822年成立时,最初的11名印度捐赠者中帕西人占其4,但帕西人的捐资占总额的50%。个人捐赠在帕西教育慈善中非常活跃,如詹余治·意之皮(Jamsetji Jijibhoy)爵士在1822年至1847年间,为各个学校和公共事业共捐资221981英镑。^③他在1849年创办的帕西慈善协会(Parsi Benevolent Institution)会规中明确指出“给予宗教建筑和学校管理提供资金援助。”^④

第三,关注社会民生也是帕西人公益事业的重点。首先在民生住房方面。1890年,慕兹班(M. K. Murzban)创立了“贫困琐罗亚斯德教徒住房基金”(The Poor Zoroastrians Building Fund),致力于帮助生活贫困的底层帕西人捐资建房。1910年,在科瓦斯·杰汉吉里爵士(Sir Cowasji Jehangir I)的建议下,帕西长老会筹款建造了一座公寓楼,专门为买不起房的帕西人提供住房,名为“休斯路小区”(Huges Road Colony)。其次,在医疗方面。到1911年为止,帕西人捐资创办的医院28间、妇产科医院18间、麻风病病院11间、疗养院17间、帕西人病院19间、休养所5间、慈善药房45间,还有其他类型的医院14间。^⑤再次,在救济灾难方面。许多帕西富族常常在灾难发生之际施以援手。例如,孟买瑞迪满力(Reddy Manli)家族的索拉吉(Sorabji)每天为数千名古吉拉特邦难民提供一天两餐,持续了一年之久。^⑥1805—1806年的孟买饥荒期间,达迪拜·纳萨万吉(Dadibhai Nasarvanji)每天帮助五六千人。^⑦

此外,帕西人的捐助对象不仅限于帕西族,还涉及印度其他族裔^⑧,甚至扩展到印度以外的地区。比如帕西商人于1853年创建的“伊朗社会促进改善会”(SACI)被视为第一个真正改善伊朗琐罗亚斯德教徒生活条件的基金会。^⑨中国香港的琐罗亚斯德大厦(Zoroastrian Building,中译名称为“善乐施”)就是帕西人建造的香港社团活动中心。在香港经商的摩迪爵士(Sir Hormusjee Nowrojee Mody)于香港大学筹建之际捐助15万港币,此后又捐资协助学校正常发展。香港大学竖有纪念其善行的青铜半身像,并在铜像下铭刻“杰出的帕西商人、著名的慈善家,香港50年来最出色的捐助者。”^⑩

① John R. Hinnells, "The Flowering of Zoroastrian Benevolence: Parsi Charities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y", *Selected Works of John R. Hinnell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14.

② John R. Hinnells, "Zoroastrian and Parsi Studies", *Selected Works of John R. Hinnell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17.

③ Dosabhai Framji Karaka, *History of the Parsis: Including Their Manners, Customs, Religion, and Present Position*,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86, p. 109.

④ John R. Hinnells, "Zoroastrian and Parsi Studies", *Selected Works of John R. Hinnell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20.

⑤ John R. Hinnells, "Zoroastrian and Parsi Studies", *Selected Works of John R. Hinnell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26.

⑥ Dosabhai Framji Karaka, *History of the Parsis: Including Their Manners, Customs, Religion, and Present Position*,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86, p. 59.

⑦ Dosabhai Framji Karaka, *History of the Parsis: Including Their Manners, Customs, Religion, and Present Position*,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86, p. 71.

⑧ John R. Hinnells, "The Flowering of Zoroastrian Benevolence: Parsi Charities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y", *Selected works of John R. Hinnell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12.

⑨ Monica Ringer, "Reform Transplanted: Parsi Agent of Change amongst Zoroastrians in Nineteenth-century Iran", *Iranian Studies*, vol. 42, no. 4, 2009.

⑩ Pare Yazdi, *The Life & Times of Sir Hormusjee Naorojee Mody*, Zoroastrian Educational Institute, 2011, p. 3.

帕西族群热衷于公益事业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帕西族群中涌现出大批拥有大量财富的家族和企业家,为公益捐助奠定了物质基础;其次,作为人口极少的少数民族,其成员往往具有较强的互助意识;再次,琐罗亚斯德教教义中“至善之行即为慷慨”^①等对善的高度崇尚是帕西人公益事业的重要精神动力。

有些人指出,帕西人在公益慈善方面的热情和贡献,是其能够成功融入印度社会的重要因素。还有人认为,帕西人并没有像犹太人那样因为实现经济崛起成为精英阶层而遭到亚洲人的排斥,就是因为他们在公益事业上的贡献。

三、当代帕西人的生存现状及其困境

据统计,当今全世界的帕西人口总数大约不超过 10 万,主要集中在孟买及其周边地区,其他的则居于苏拉特(Surat)和卡拉奇(Karachi)等城市。此外,在北美和欧洲、大洋洲也有相当数量的帕西人。大多数帕西人作为个体,其生活境况依然相当优渥,但从帕西族群的整体发展来看,生存困境也显而易见。

1. 商业的新发展与新挑战

1857 年的印度民族起义导致东印度公司的终结。随着英国政府取代英国东印度公司接管印度,帕西人与英国的特殊关系也逐渐消失。20 世纪初,包括帕西族群在内的印度民族资产阶级都在一战、二战以及各种民族解放运动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一战后的 20 年里,印度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其中也包括主要的帕西家族产业。但好景不长,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开始,外国商品铺天盖地而来,对几乎所有的印度工业构成严重威胁。进口设备的高昂价格使得创业成本过重,生产成本再次上升。消费能力大大限制了内需,造成产品滞销和资金积压,严重影响生产的正常运行。以上种种都影响着帕西工业的正常发展,有很多企业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中最终破产。^②

首当其冲的是纺织业受到多重负面影响。第一,投资棉花贸易和纺织业的印度人蜂拥而至,造成该行业的利润急剧下降。第二,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国际贸易开始向印度东部转移,印度西部的棉花出口逐渐减少。第三,日本靠金融手段转嫁经济危机,在印度市场倾销纺织产品,棉布的价格几乎等同于原棉价格,迅速抢夺了印度的大量市场份额。同时伴随着远东市场逐渐被日本占领,印度纺织品不得不转为内销。第四,英国政府对印度纺织品开始征收 3.5% 的工厂税,这对已经在国内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印度纺织业来说犹如落井下石。第五,印度生产的细布细纱与英国形成竞争关系,但印度布生产成本低,质量逊色,因此销售面临着诸多困难。^③与此同时,因为对外贸易严重受挫,对船只的需求大大削弱,加之蒸汽轮船的横空出世,使得帕西人引以为傲的造船业一蹶不振。直到棉纺织业、制糖业、丝织业等得到关税保护后,这样的困境才有所缓解,但那些没有获得关税保护的产业,仍然难逃破产或停滞的局面。

然而,帕西人并未就此颓废,他们突破困境,需求新机遇,并在个别产业上获得一定发展。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尤其制糖、水泥和化学等新兴工业绝地逢春,发展迅速,并形成了达尔米亚水泥(Dalmia)和联合水泥公司(ACC)并雄的局面,其中后者即以帕西塔塔(Tata)家族为首。塔塔财团是一战后印度民族资本最早形成的大财团,他们不仅在水泥产业上头角峥嵘,在化学行业也独领风骚,与英资的帝国化学公司势均力敌。至二战前,塔塔集团

① J. De Menasce, *Le Troisième Livre Du Dénkart*, Paris: Librairie C. Klincksieck, 1973, p. 53.

② 参见(德)赫尔曼·库尔克、迪特玛尔·罗特蒙特著,王立新、周红江译《印度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8 年,第 109 页。

③ 参见 N. B. Mody, *The Parsis in Western India: 1818 to 1920*, Bombay: Allied Publishers, 1998, p. 367.

坐拥 25 家公司,资本达 1.0462 亿卢比,成为名副其实的民族资本领头羊。

20 世纪中期,大量的青壮年帕西人从周边迁徙至孟买,使周边地区遗留下大量老弱病残。^①印度独立后,各种农村土地政策的实施使得孟买周边地区所剩的帕西族弱势群体生存环境雪上加霜。此外,在国有化运动中,许多帕西人的公司被收为国有,一些公司无奈破产。但诸如塔塔、莫迪(Modi)、噶迪(Godrej)等帕西大家族的产业,至今仍然是影响印度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支撑性产业。

2. 帕西族群的内外冲突

帕西人从古代波斯跋山涉水,历经坎坷才最终定居西印度并像“牛奶中的糖”一样成功融入当地社会。但随着社会的变革和时代的发展,帕西族群与印度其他族群之间的冲突逐渐显发,帕西族群内部也表现出多种矛盾,这让帕西族群的发展面临各种挑战。

第一,帕西族群和印度其他族群之间的冲突。一方面,帕西族群与印度其他民族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文化和种族的疏离感。帕西人作为琐罗亚斯德教的信徒,虽然在以难民身份移民到印度后把古吉拉特语作为他们的母语,并很好地融入印度社会,但他们认为自己与有着不同宗教实践、祭司、社区及社会结构的印度民族差距很大。^②帕西族凭借其在政治、商业和专业领域的成功,在印度社会脱颖而出。但这种社会经济成功带来的优越感又往往会伴随着一定的分离感。另一方面,“尽管他们成功地定居下来,并对印度作出了承诺,但他们仍然与祖先的土地保持着强烈的情感联系”。^③这在许多印度帕西人心理上造成一种暂住而非永久居民的意识,以及一种在需要时随时准备继续前进的感觉。^④总之,随着帕西人在印度的经济崛起,逐渐形成了易于识别的特征,使他们与印度其他族群相区别。因此,帕西族群难免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嫉妒和敌对势力的影响,为帕西人带来挑战。

第二,帕西族群内宗教力量与世俗力量的冲突。首先,帕西人的宗教组织松散。如前文所说,帕西祭司并非宗教团体的绝对领袖,也很少行使真正的领导权,反而经常受到普通信徒的挑战和质疑。宗教团体权力的空白,通过建立“大公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填补。但事实表明,这些组织往往由于内部纷争而命运多舛,功能涣散。其次,缺乏有凝聚力的宗教权威。因为大祭司们各自为政,常常导致教派、团体之间的争端。如 19 世纪,瓦迪亚阿塔什巴勒姆(Wadia Atash Bahram)的桑贾纳斯(Sanjanas)和安茹曼阿塔什巴勒姆(Anjuman Atash Bahram)的贾马萨斯(Jamas Asas)两座神庙,就资历、祭司入会仪式、供品的分配等问题争论不休,最终导致了 1882—1884 年间一系列激烈的法庭诉讼。^⑤这些争端对族群凝聚力造成很大伤害。总之,缺乏社区凝聚力的情况往往会因为宗教领袖的缺位和世俗大公会的软弱而变得更加严重。^⑥

第三,帕西族的个人与族群之间的冲突。帕西人拥有诸多优秀品质,使得他们在印度取得很大成功。但同时,一些具有负面影响的特征被不断滋养,比如较强的个人主义。经济崛起过程中,帕西族群出现了一批大富豪和一些富大家族,他们享有不少特权。首先是强调获得高等教育的资格;

① 参见 Dr.(Miss) M.D.Bengalee,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on All India Birth Rate of Parsi-Zoroastrians from 2001 till 15th August”, 2007. 转引自赵瑛《印度帕西人的由来、发展及其面临的问题》,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年,第 35 页。

② Weaver David John, *The Parsi Dilemma: A New Zealand Perspective*, Victoria: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2012, p.141.

③ John R.Hinnells,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Authority among Parsis in British India”, in John Hinnells and Alan Williams(eds.), *Parsis and the Diaspor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265.

④ John R.Hinnells,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Authority among Parsis in British India”, in John Hinnells and Alan Williams(eds.), *Parsis and the Diaspor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726.

⑤ John R.Hinnells,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Authority among Parsis in British India”, in John Hinnells and Alan Williams(eds.), *Parsis and the Diaspor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107-108.

⑥ Weaver David John, *The Parsi Dilemma: A New Zealand Perspective*,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2012, p.142.

其次是强调个人的高度成就,特别是作为地方政治领导人在公共领域的成就;第三是强调社会各界对他们世俗成功的普遍赞誉。强烈的个人主义会在族群内中造成一定裂痕。如韦弗所指出,帕西族群衰落的一个原因是帕西文化的重要性,特别是传统上以牺牲社区凝聚力为代价强调个人成就。^①

第四,帕西族群中不同政治立场的冲突。帕西人的近代崛起离不开英国人的扶持,但过度依赖英国人反过来又会产生一种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结束后,“帕西群体在英国统治下享有的巨大政治影响力的日子,尤其是在孟买,结束了,再也不会回来了”^②。有一部分人预见到英国统治的结束是重大转折,这将危及他们作为一个独立族群的生存,因此准备投入独立后的新政权,从而重申古老的帕西族支持统治当局的道德观念,而不论其政治构成如何。^③事实也证明,那些支持新政权的帕西人,非但没有作为局外人受到迫害,反而被赋予重要的职位,如政治家、军队领导人、科学家、实业家、医生和律师。^④但也有一些帕西人强烈排斥新政权,并选择移民国外。这种情况下,支持与排斥新印度政权的人之间形成了巨大张力。

以上几种帕西族群面临的内外冲突,使得本就有着衰落迹象的帕西族面临着分崩离析的潜在危险。

3. 人口问题及其原因

帕西族群的诸多特性,在历史上为他们提供了很多的优势和机会。但 20 世纪以来,他们的一些文化特征,对于这个古老而独特的族群反而形成一种威胁,如帕西族群的紧密性和封闭性以及种族纯洁的坚持,成为他们未来发展的重要限制因素,尤其在人口问题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

1901 年帕西人计有 93952 人,49% 居住在孟买。直到 1941 年,印度帕西人的数量一直在稳步增长,1941 年达到顶峰,共 114890 人。此后,帕西人的数量逐渐下降。印巴分治后,巴基斯坦拥有一定数量的帕西人,1951 年为 5235 人,1981 年下降到 3700 人。^⑤1971 年,印度帕西人为 91226 人^⑥,1981 年为 71630 人,2001 年为 69601 人^⑦。从每 10 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总数来看,除了 1981—1991 年,帕西总人口增加了近 5000 人之外,1941—2001 年间,每十年都有所下降,降幅最大的是 1971—1981 年间,下降了近 20000 人。^⑧官方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印度的帕西人口总数从 1941 年的 114890 人下降到 2001 年的 69601 人,降幅高达 39.2%。(见表 1,下页)^⑨1951—2001 年期间,印度人口增长了近 185%,但同期帕西人口却出现了 37.7% 的负增长。^⑩

引起帕西人口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晚婚和不婚的比例升高。1962 年,帕西族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为 26.5 岁,男性为 31.4 岁,此后一直徘徊在这个水平上。^⑪1973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 31—45 岁的女性中,未婚者占 27%。

① Weaver David John, *The Parsi Dilemma: A New Zealand Perspective*,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2012, p.215.

② Eckehard Kulke, *The Parsees in India: A Minority as Agent of Social Change*, Munich: Weltforum Verlag, 1974, pp.263–264.

③ M.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1979, p.223.

④ Weaver David John, *The Parsi Dilemma: A New Zealand Perspective*,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2012, p.215.

⑤ Rashna Writer, *Contemporary Zoroastrians: An Unstructured Nation*, Millbur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4, p.152.

⑥ Eckehard Kulke, *The Parsees in India: A Minority as Agent of Social Change*, Munich: Weltforum Verlag, 1974, p.35.

⑦ Zubin Cyrus Shroff and Marcia C.Castro,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Intermarriage on the Population Decline of the Parsis of Mumbai, India” *Demographic Research*, vol.25, no.17, 2011.

⑧ John R.Hinnells,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Authority among Parsis in British India”, in John Hinnells and Alan Williams(eds.), *Parsis and the Diaspor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2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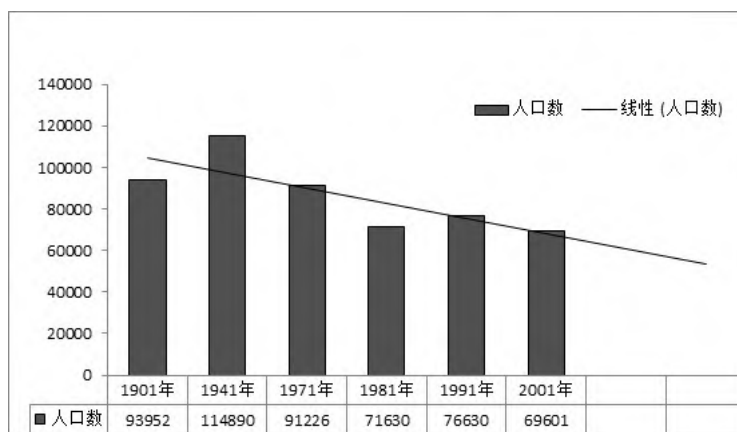
⑨ John R.Hinnells, “Zoroastrian and Parsi Studies”, *Selected Works of John R.Hinnell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13.

⑩ Eckehard Kulke, *The Parsees in India: A Minority as Agent of Social Change*, Munich: Weltforum Verlag, 1974, p.235.

⑪ D. Patel, Jaago Bidari, *Rescuing our Community from a Demographic Crisi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orth American Zarathushti Congress, Houston, December 30, 2010.

1890年,大多数妇女的结婚年龄在16—20岁之间,而1901年约有一半妇女的结婚年龄在20岁以上。^①到了20世纪40年代,25—29岁是首选的结婚年龄段。^②此外,不结婚的情况也有增加趋势。1901—1941年间,孟买的帕西族人口增长了29%,而结婚率仅增长了22%。1881年,接近76%的成年祭司已婚,但1931年,成年祭司结婚率只有41%。^③妇女在生育期结束时的未婚比例,从1881年的不到1%上升到1971年的17%。^④1999年,终生未婚的帕西妇女占比高达30%。^⑤祖宾等人认为,帕西生育率下降,与1870年后社区女性受教育率的迅速提高有关。^⑥综合来看,晚婚乃至不婚的缘由可以归结为城市化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全方位西化的影响。

图1 1901—2001年印度帕西族群人口变化 (单位:人)^⑦



第二,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加快。一个多世纪以来,帕西族生育率一直在下降,1961—1970年是总生育率(TFR)低于更替水平的第一个时期,孟买帕西人的总生育率在1881年为4.41,^⑧1999年下降到0.94。^⑨如前文所述,帕西人晚婚和不婚的比例升高是导致人口生育率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此外,一些研究指出,印度帕西社区目前的人口危机是由于他们因近亲繁殖而变得性衰弱。^⑩还有人指出,一些“富裕病”所导致的人口大量死亡使帕西族群的人口出生率下降。此外,从人口年龄分布来看,在帕西族中14岁以下人口仅占12%,而60岁以上人口占30%之多。而且自1955年以来,每年的死亡人数都超过出生人数。^⑪

① P.Axelrod,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Factors in The Population Decline of The Parsis of India", *Population Studies*, vol.44, no.3, 1990.

② C.Chandra Sekar, "Some Aspects of Parsi Demography", *Human Biology*, vol.20, no.2, 1948.

③ Eckehard Kulke, *The Parsees in India: A Minority as Agent of Social Change*, Munich: Weltforum Verlag, 1974.

④ L.Visaria,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mong Parsis, 1881-1971",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43, no.9, 1974.

⑤ D. Patel, Jaago Bidari, *Rescuing our Community from a Demographic Crisi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orth American Zarathushti Congress, Houston, December 30, 2010.

⑥ Zubin Cyrus Shroff and Marcia C.Castro,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Intermarriage on the Population Decline of the Parsis of Mumbai, India", *Demographic Research*, vol.25, no.17, 2011.

⑦ 数据乃作者根据前文所及 Rashna Writer, Eckehard Kulke, Zubin Cyrus Shroff and Marcia C.Castro, John R.Hinnells 的文献整理。

⑧ L.Visaria,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mong Parsis, 1881-1971",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43, no.9, 1974. Zubin Cyrus Shroff and Marcia C.Castro,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Intermarriage on The Population Decline of The Parsis of Mumbai, India", *Demographic Research*, 2011, vol.43, no.9, 1974.

⑨ S.Unisa, R.B.Bhagat, T.K.Roy and R.B.Upadhyay, "Demographic Transition or Demographic Trepidation: The Case of Parsis in Indi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43, no.1, 2008.

⑩ T.M.Luhrmann, *The Good Parsi: The Fate of a Colonial Elite in a Post Colonial Society*,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32-133.

⑪ John R.Hinnells, *The Zoroastrian Diaspora: Religion and Migr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第三,一批帕西人移民国外。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结束后,帕西人在印度,尤其是在孟买,不再享有特权地位,一部分人认为未来的前景和生活方式不再适合他们,这一信念推动了移民的发展。^①同时,一些帕西人拒绝新印度政权。这部分人形成了一个稳定且快速发展的侨民团体,他们首先在英格兰、加拿大和美国,后来在包括新西兰在内的世界许多地方,寻求更适宜的环境以实现个人的社会经济发展。^②这一部分人的移民,也造成了印度帕西人口的流失。

第四,对与外族通婚的保守态度。帕西族群是一个内婚制和不改宗的族群,传统上拒绝让其他信仰的人皈依,这就意味着一个新生儿被视为帕西人的必要条件是帕西父亲。^③如果一个帕西女性嫁给一个非帕西男性,她的后代将不再被视为帕西人。如果一个帕西男人娶了一个非帕西人的女人,他的后代可以被视为帕西人,但他的妻子仍不是帕西人。^④尽管帕西族群在历史上一直保持着内婚特征,但在过去几十年中,由于帕西人生活方式和婚姻态度的改变,使得大量人口开始选择族外通婚。而女性参与劳动力的增加,使得她们自由选择与其他族群异性交往的几率上升,这也导致了异族通婚的大幅增加。^⑤从 20 世纪 70—90 年代,外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1991 年,孟买所有帕西婚姻中,族外婚姻占 19%,到 2005 年增至 32%,到 2010 年增至 38%。^⑥是否接受帕西女性与异族通婚所生子女为帕西人是一个极具争议和分歧的问题。与保守派不同的是,自由派帕西人认为异族通婚是当今印度的必然趋势,而接受这些婚姻的子代也将有助于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人口的减少。^⑦

同时,对于帕西人口锐减的原因还有其他观点,如韦弗认为,印度帕西社区人口下降的最重要因素是他们对个人物质成功的传统追求。^⑧埃克哈德·库勒认为,印度独立后政治重组的困难,加上宗教改革的失败,是缺乏社区凝聚力和人口下降的主要因素。^⑨此外,由于帕西人在保存古老伊朗宗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个民族宗教团体的灭绝也将导致这一宗教传统的丧失。^⑩这将是印度和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悲惨损失。总之,帕西族群人口减少及族群灭绝的潜在可能性,已引起了社会科学家和帕西族群本身的高度关注。^⑪

四、结 语

诚如欣内尔斯所说“帕西人真是一个让人感到惊奇的族群。”^⑫他们现在是印度最小的族群,

① John R.Hinnells, *Zoroastrianism and the Parsis*, Bombay: K.R.Cama Oriental Institute, 1981.

② John R.Hinnells,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Authority among Parsis in British India”, in John Hinnells and Alan Williams (eds.), *Parsis and the Diaspor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2-3.

③ F.Nariman, *Zoroastrianism: The Faith of the Parsis in India*, New Delhi: Foundation for Univers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Dalai Lama, 1999; Eckehard Kulke, *The Parsees in India: A Minority as Agent of Social Change*, Munich: Weltforum Verlag, 1974, p.265.

④ M.Sharafi, *Bella's Case: Parsi Identity and the Law in Colonial Rangoon, Bombay and London, 1887-1925*,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History Department, 2006.

⑤ P.Axelrod,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Factors in The Population Decline of The Parsis of India”, *Population Studies*, vol.44, no.3, 1990.

⑥ 参见 *Parsiana Magazine*, Mumbai: Parsiana Publications, August 2006, May 2011, 2001-2003.

⑦ Zubin Cyrus Shroff and Marcia C.Castro,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Intermarriage on the Population Decline of the Parsis of Mumbai, India”, *Demographic Research*, vol.25, no.17, 2011.

⑧ Weaver David John, *The Parsi Dilemma: A New Zealand Perspective*,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2012, p.215.

⑨ John R.Hinnells and Alan Williams eds., *Parsis in India and the Diaspor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6.

⑩ M.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1979, p.352.

⑪ S.Unisa, R.B.Bhagat, T.K.Roy and R.B.Upadhyay, “Demographic Transition or Demographic Trepidation: The Case of Parsis in Indi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43, no.1, 2008.

⑫ John R.Hinnells, “Zoroastrian and Parsi Studies”, *Selected Works of John R.Hinnell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11.

但却是对南亚次大陆影响最大的民族之一。^①印度的帕西人仅占印度总人口的不到 0.007% ,这个数字在很大程度上遮盖了这个民族曾经对现代印度特别是孟买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非凡影响。^②帕西人的先祖当初为了坚守信仰而被迫离开伊朗 ,在长期的艰难困苦中顽强生存 ,在异国他乡得以重生 ,从琐罗亚斯德教团体发展成为一个新的族群 ,其内在凝聚力也从简单的宗教诉求上升到复杂的族群认同。在西人东来时 ,他们迎接挑战 ,实现经济上的崛起 ,并给整个孟买、印度乃至南亚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带来重要影响。如果说 8 世纪帕西人最初登陆印度时第一次主动调适是为了在印度求得生存空间 ,那么 19 世纪发展经济和现代化改革的第二次调适则使之崛起于印度 ,并成功融入社会 ,彰显价值。这两次调适都是微小群体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 ,为实现心理与社会的内外交互平衡而采取的生存策略。

然而 20 世纪以来 ,帕西族群遭遇到新的挑战 and 危机 ,面临着生存困境。一方面 ,古老而厚重的文明基因和文化传统是帕西人成功崛起并融入社会的重要因素 ,但在面临新的政治、经济环境时 ,这些传统和基因又形成了其内向型生存模式与样态 ,加剧其封闭性、保守性 ,使其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时表现消极;另一方面 ,帕西人长期的颠沛流离和自始至终的“客籍”身份已经深入集体意识 ,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感和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始终萦绕心头 ,所以在新的社会环境下 ,帕西族群在满足归属和安全等社会心理需求方面存在障碍。于是一部分人寄希望于更大的突破 ,再次移居他国。

总体来看 ,帕西人的社会融入是成功的 ,但是由于其自身的独特性 ,加之印度社会被种姓制度、宗教文化传统所固化的隔离性和排他性 ,使得帕西人的融入是不彻底的。这种“不彻底”是双刃剑 ,既保留了帕西族群的标识性 ,但又增加了其生存困境风险。若想解决帕西族群面临的危机和问题 ,可以从以下四方面考虑:第一 ,当地政府对人口较少的族群加以特殊扶助;第二 ,重视并强化以宗教认同为核心的精神文化凝聚力 ,并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第三 ,族群内部应该致力于某些陈规陋习的改革 ,并努力找到新的突破口 ,重振经济;第四 ,利用现有资源带动经济发展 ,比如侨民优势等。总之 ,帕西人经济崛起和融入社会的经验值得总结 ,其现代化改革成效和社会贡献值得肯定 ,而他们的人口问题和生存困境更值得关注和研究 ,为认识小族群在生存适应、社会融入、心理调适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供借鉴。

Abstract In the 19th century , when European countries such as France , Britain , Portugal and Holland entered India , the Parsi people met the challenges and seized the opportunities by virtue of their excellent skills , business talent and good character , and realized economic rise and became the elite class of India through shipbuilding , textile industry and managing agencies , hence having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economy and life of India and even the whole South Asian region. At the same time , the Parsis actively introduced Western education and modernized their administration and religious traditions. However , since the 20th century , the Parsi community has been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s of shrinking commerce and multipl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flicts , and particularly the serious threat of sharp population decline.

(谢志斌 , 讲师 ,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 西安 , 710127)

(责任编辑: 石茂明)

① John R. Hinnells and Alan Williams(eds.) , *Parsis in India and the Diaspora*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2007 , p.1.

② Eckehard Kulke , *The Parsees in India: A Minority as Agent of Social Change* , Munich: Weltforum Verlag , 1974 , p.12.